

郭文元◎著

周作人

对中国传统文学的
发现和转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郭文元◎著

周作人

对中国传统文学的
发现和转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发现和转化 / 郭文元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161 - 8600 - 8

I. ①周… II. ①郭… III. ①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017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曲弘梅
责任编辑 慈明亮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93 千字
定 价 6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发现与转化》

（项目批准号：16XJA751001）项目资助

天水师范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周作人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24)
第一节 《诗经》经学研究的解构	(25)
一 周作人早期对《诗经》经学研究的解构	(25)
二 对外来圣书文学研究的介绍	(27)
三 对《诗经》经学研究的批判	(31)
第二节 《诗经》文学研究源流的建构	(33)
第三节 《诗经》中的生物考证与伦理自然化	(43)
第二章 周作人对原始儒家思想的发掘	(52)
第一节 周作人眼中的《论语》	(52)
第二节 《〈论语〉小记》论《论语》思想	(55)
第三节 对《孟子》《礼记》及其他典籍的文学拆解	(67)
第三章 周作人对六朝文章气象的发现	(73)
第一节 六朝文章的发见	(73)
第二节 六朝名家文章之解读	(84)
一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思想宽博，文辞恬澹	(84)
二 陶渊明文诗：意诚而辞达，功竟在身后	(88)
第三节 六朝佛经中的思想与文章	(95)
第四章 周作人对唐宋文、桐城文之“器识与文章”的批驳	(108)
第一节 唐宋文与六朝文之争	(108)
一 民初桐城派和选学派的论争	(108)
二 “五四”新文学与“谬种”“妖孽”的论争	(111)

2 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发现和转化

第二节 现实挤压下对传统文学的发掘	(113)
一 初遇桐城派	(113)
二 两方面挤压下对传统文学的发掘	(116)
第三节 桐城文、唐宋文批判	(118)
一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集中火力的批判	(118)
二 潜行的工作：挖根唐宋文	(123)
第四节 韩愈：“器识和文章都无可取”	(132)
第五节 宋儒：圣学之时文	(140)
第六节 苏轼晚年的反省	(144)
 第五章 周作人对晚明文章反抗精神的认同	(148)
第一节 公安竟陵派：文学不革命却是反抗的	(148)
第二节 李贽、张岱和王思任的思想、文章	(159)
一 李贽：文章和思想的反叛	(159)
二 张岱、王思任的文章：趣味、俳谐、谑	(164)
第三节 晚明小品在清代的死去活来	(169)
 第六章 周作人对清人笔记中思想与文章的整理	(177)
第一节 清人笔记的选择	(177)
第二节 清人笔记中的人情物理	(182)
一 情系无告者：妇女、儿童和老人	(182)
二 士大夫之病：不把人当人	(185)
三 丧乱纪事中的文化传统	(187)
四 鬼后的人情	(189)
五 “天堂”“地狱”之外的凡俗人世	(192)
第三节 俞正燮、刘献廷、焦循、马时芳思想的择取	(196)
一 俞正燮：疾虚妄的明灯	(196)
二 刘献廷：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	(203)
三 焦循：看取常识与思想宽博	(205)
四 马时芳：庸言庸行中的人情物理	(208)
第四节 清人笔记中的文章思想	(210)
一 郝懿行：经师文章的风趣和见识	(210)
二 傅山：反“奴俗”文章	(213)
三 冯班：崇本色而批俗论	(215)

四	顾炎武：文章的“益”与“诚”	(218)
五	颜元：作“时文”的秘诀——无定见、说体面话	(220)
六	蒋湘南：以时文为古文的桐城派	(222)
七	毛奇龄：土洋党八股的祖宗——试帖诗	(223)
八	龚自珍：自烧功令文	(224)
九	刘玉书：论鬼的通达态度	(225)
十	王士禛：姑妄言之的谈鬼为文	(227)
十一	纪昀：鬼故事的材料	(228)
十二	孙彦清：民俗学资料	(229)
 第七章 周作人眼中的传统文章体式		(231)
第一节	周作人的文学观、语言观、文体观	(232)
第二节	赋得之文：古文、八股文、策论、试帖、宣传等	(236)
第三节	即兴之文：小品文、序跋、家训、尺牍、笔记等	(245)
 主要参考文献		(255)
 后记		(259)

绪 论

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学在吸收外来异质文化、复兴自身传统时，既有对传统文学的全盘否定，也有把传统文学“照在现代科学知识的日光里”^①的重新发现和建构。只是，从晚清开始的激进文化思潮在20世纪逐渐占主导地位，遮蔽了相对温和的对传统文学复兴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文化断裂说”^②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作为兼容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的新文学运动代表性人物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一面批判传统文学，一面又在提倡中国文艺复兴^③，在现代性内在冲突中，在传统文学内部发现并构建出一种非正统的中

① 周作人：《论八股文》，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7页。（注：本书所引周作人散文文献都出自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为避免重复，下文只注卷次和页码，不再注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② 八九十年代，部分作家、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偏激”地斩断了传统文化，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大断裂，全盘反传统与全盘西化彻底断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使得中国的人文精神失落。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人物有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历史月刊》（台北）1990年第29期〕、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等人。

③ 周作人在1924年作的《生活之艺术》中说：“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514页）他在1926年作的《〈陶庵梦忆〉序》中说：“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第832页）

国文学传统，将新文学建基于再发明的传统文学之上^①。由于周作人历史身份的特殊，周作人研究在 80 年代才得以逐渐重新起步，而对周作人用现代意识考掘与重造本土性文学资源以建设现代中国文学的论题，到目前为止，学术界研究仍显得不足。因此，本书选择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发现与转化为研究对象，考辨中国传统文学在周作人的现代转型中如何被取舍、重构和激活，从而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本土性资源的问题，以观察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情状，思考“五四”反传统文学与当前弘扬传统文学的内在联系。

一

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从 20 世纪初开始到 60 年代结束，历经半个多世纪，对其散文的研究断断续续已近一个世纪。20 世纪文化潮流以激进为主，周作人研究中，关于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学关系的研究，80 年代前研究不足，80 年代后重要性渐显，21 世纪研究开始深入，仍然缺少专门系统的研究。

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 1945 年入狱前，有众多论者在评论周作人散文时涉及其与传统文学的关系，虽未成为主要话题，也可看出不同价值立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由于文学家、评论家都集中注意力于文学革命，并没人注意周作人对传统文学的态度，朱光潜在评价《雨天的书》时捎带过一句，认为周作人散文文字的简洁“得力于古文”^②。虽然周作人在 1924 年就提到要“建造中国的新文明”“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③，1926 年提出现代散文是“文艺复兴”的产物的说法，但这种文学“复兴”的说法一直要到 1928 年周作人发表《闭户读经论》后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到 1932 年周作人发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载道”与“言志”标准重构中国文学传统，才有评论者谈论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态度。在批评方面，钱锺书补充诠释周作人“文艺复兴”的说法，认为周作人所列举的文学“复兴”的历史正是文学“革命”的历史^④；陈子展认为周作人推崇公安“三袁”是意在争文学上的正统地位^⑤；许杰代表左翼批评家立场，

① 参见张旭东的《现代散文与传统的再发明——作为激进诠释学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现代中国》第 12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见明石（朱光潜）《〈雨天的书〉》，《一般》第 1 卷第 3 号，1926 年 11 月。

③ 见周作人《生活与艺术》，《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3 卷，第 514 页。

④ 见中书君（钱锺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新月》第 4 卷第 4 期，1932 年 11 月 1 日。

⑤ 见陈子展《公安竟陵与小品文》，陈望道编《小品文与漫画》，生活书店 1935 年版。

认为周作人提出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晚明文学思想复兴的观点,是“机械的循环论”文学史观的证明^①。这些评论者由于强调“五四”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革命性,因而对周作人的看法主要持批评态度。在持认同态度方面,有曹聚仁、林语堂、废名、韩侍桁、蔽芾等人,他们认同周作人以“言志”与“载道”的交替来叙述中国文学历史变化的看法,^②并且废名认为周作人散文似陶渊明诗,在平淡中蕴藉着至味,与公安派的“才情之作”不同^③,贺凯认为周作人在欣赏明朝小品文是在强调“反抗”意识^④。这些评论者更看重周作人对现代新散文的建设意识,因此对周作人对传统文学资源的发现和对文学秩序的重构持认同态度。废名、贺凯等的看法在当时并没能引起评论者的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舒芜、钱理群、刘绪源、黄开发等学人指出他们看法的重要性。以上两方面的评论,体现了评论者所持立场的不同,也显示了周作人文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学关系本身的复杂性。

抗战期间由于周作人政治上的附逆,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学关系的研究受到极大影响,对周作人此期散文的研究主要在沦陷区进行。倒是周作人在多篇文章中谈自己对传统文学的态度^⑤,并做了大量对中国传统文学整理的工作。沦陷区的文载道、胡兰成、南冠、莫庵、黄陇西等在认同周作人抗战时期散文中的“文言”成分时,努力发掘周作人散文中“真诚”“亲切”“醇厚”的味道等,^⑥这些评论沿着抗战前对周作人散文思想认同的评论话语展开,是对周作人“文艺复兴”思想的再次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周作人附逆之前与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学态度的内在一致性,而这一点多不为后来研究者所注意。

纵观“五四”新文学运动到1945年周作人入狱前的研究史可以看到,不同价值立场的评论者对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学关系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不同历史时期认同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学关系的评论者,对周作

① 见许杰《周作人论》,《文学》第3卷第1号,1934年7月。

② 这些文章分别有曹聚仁的《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林语堂的《小品文的遗绪》、废名的《〈周作人散文抄〉序》和《周作人散文抄》、韩侍桁的《关于〈自己的园地〉》等。

③ 见废名《关于派别》,《人间世》第26期,1935年4月20日。

④ 见贺凯《周作人的趣味文学》,载于陶明志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年版。

⑤ 如《汉文学的传统》《怎样研究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前途》《新中国文学复兴之途径》《文艺复兴之梦》等文。

⑥ 这些文章分别有文载道的《读〈药堂杂文〉》,胡兰成的《周作人与路易士》,南冠的《读〈药堂语录〉》,莫庵的《读知堂文偶记》,黄陇西的《读〈药堂语录〉》。

人散文的评论又有前后的一致性。“五四”时期的评论家和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评论家看重周作人散文思想中革命性、反传统的一面，而自由主义倾向的评论家看重周作人复兴传统文学来建设新散文的一面，两者的论述并不在同一层面，在整体上也都缺乏系统性。

1945 年周作人入狱到 1980 年，此期间由于政治原因，国内的周作人研究几成一片荒芜状。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① 虽也涉及周作人散文创作，并“在当时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保持了一个文学史家的求实精神和稳重的态度”^②，文中也不触及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③ 则对周作人散文持全面“批判”的态度。这一时期，对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学关系有深度的研究，是由一些海外汉学者做出的，如日本学者木山英雄、伊藤德也、英国学者卜立德等。木山英雄认为周作人“所坚信的作为文学之自我表现的最自然、最自由形态的散文，（是）通过回归文学和自我的传统之无拘无束，却得以持续地发展下来”的散文^④，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学的选择主要受“自身及自身所代表的本国国民的素质和趣味”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将“文学革命”重新定义为“文艺复兴”，创造出了“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又这样地新”的散文理念，并将散文推崇为“文学发达的极致”^⑤。这种从周作人身受的传统文化来讨论周作人文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关系，在理论上更有系统性。日本学人伊藤德也认为木山英雄的这种论述对于理解转变时期的中国文学思想，是一个非常富于启示的结论^⑥，并进一步认为作为思想改革家的周作人在注意到葛理斯的“生活的艺术”观后，把文学艺术放在了宽广的“生活的艺术”中，因此写的东西也就不再局限于“文学作品”或是“文艺批评”的“纯文学”中，这种趣味使得周作人明确意识到了古代中国文学的趣味。木山英雄、伊藤德

①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新文艺出版社 1954 年版。

② 黄开发：《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3 页。

③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 1 册，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年版。

④ 参见〔日〕木山英雄《实力与文章的关系——周氏兄弟与散文的发展》，《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⑤ 参见〔日〕木山英雄《周作人——文学与思想》，《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⑥ 参见〔日〕伊藤德也《艺术的本义——周作人〈生活的艺术〉的构造》，孙郁、黄乔生编《回望周作人——研究述评》，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也的研究为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现代转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另外,英国学者卜立德的《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文艺思想》^①,采用西方现代语言学中词源学的研究手法,将周作人文艺思想中一些重要概念放在古代文学领域内进行了梳理。海外学者的研究采用不同于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和视角,在80年代后传入国内,对周作人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80年代对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学关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舒芜的研究中。舒芜在整体上概括了周作人散文的一些审美特点,如“苦味”“丰腴”“质朴”“高远清雅”“蕴藉而恢诡的趣味”“善于吸收运用文言文的成分”,这些评论是对三四十年代周作人散文评论的一种概括,但与前人不同,舒芜认为周作人是“把中国古代的隐士文学也加以现代化”,“到了一九二八年,周作人给他要提倡的现代隐士文学(亦即现代化的明末小品文学)找到一个支点:不革命,而有反抗性”。^②后来舒芜又从周作人散文历来被认为闲适平淡之处感到了内在的辛辣味,认为1928—1945年的周作人散文是“刊落浮华,枯淡瘦劲,而腴润自在其中,文境更高”,对周作人“抄书体”散文大加赞赏。^③这样的论述中,舒芜完成了对周作人三四十年代文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关系的一个隐约定位,即周作人是用现代思想重构中国传统文学秩序。

进入90年代,舒芜注意到周作人不同时期对不同传统文体的看重,五四时期也看重传统小说的周作人到20年代中后期“差不多完全否定了小说和诗,只看重杂文学”,“这与当时的那种只看重纯文学,尤其是看重小说新诗的一般文学观念比较起来,就有很大不同”^④,周作人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的文章观是倾向于中国传统文章观的,但思想却是现代的^⑤。舒芜进一步分析了周作人对八股文体、唐宋八大家、桐城派文学的批判^⑥,他的研究不单在评价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也是在探寻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史,这种研究部分地揭开了周作人文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学思想

① [英]卜立德:《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文艺思想》,陈广宏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舒芜:《周作人概观》,《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第5期。

③ 舒芜:《周作人后期散文的审美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

④ 舒芜:《向低处广处看——周作人的文艺文化结构观》,《中国文化》1991年第2期。

⑤ 参见舒芜《重在思想革命——周作人论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1995年第1期。

⑥ 参见舒芜《中国新文学史的“溯源”——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的批判》《八股文与新文学》,《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现代转变的复杂关系。舒芜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能把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现代转化真正放在中国文学流变的过程中来考察，这使其成为周作人文学思想与传统文学关系研究中最重要研究者之一。后黄开发说：“周作人对新文学源流看法引起过人们不同程度的注目，而他对新文学建设的主张则极少有人问津。”^①这说明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关系中的大量具体问题还没有引起更多周作人研究者的注意。

90年代，钱理群认为周作人“寻找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内在联系”，是要“使五四新文学真正在本民族的土壤上扎下根来”^②，明确定位周作人对传统文学现代转化的现代性价值，学界始深入探究周对传统文学转化和对新文学建设的内在理路。陈平原的《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文章”》发掘周叙述“六朝文章”而实现的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认为经周作人解构、挑选、转化、重建的六朝文作为重要传统资源滋养着现代中国散文。^③钱理群、赵京华、刘绪源、文载道、张中行等人在谈论周作人散文时，视域有向周作人三四十年代散文转移的趋向，^④这种转移对发掘被忽视了近半个世纪的周作人三四十年代散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是他们研究的重心并不在直接论述周作人文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具体关系上。这种对周作人三四十年代散文的研究，引起了王福湘、解志熙等人的严厉批评，认为周作人研究中存在着“摒弃历史观点，切断文学和时代、和社会生活的联系”，“从根本上颠覆中国文学审美中重视人品与文品关系的优良传统”的偏颇。^⑤针对这种批评，舒芜指出，周作人“在文学上思想上的成就太大，我们不应该用一顶‘汉奸文学’的帽子一笔抹杀，那不符合历史，也不利于我们继承这一份不该拒绝的遗产。至于他叛国附敌，这是政治行为，对此当然要用政治标准，无须曲为

① 黄开发：《新时期周作人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②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69页。

③ 陈平原：《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文章”》，《中国文化》1997年第21期。

④ 相关文章有钱理群的《关于周作人散文艺术的断想》，赵京华的《周作人审美理想与散文艺术综论》，刘绪源的《解读周作人》《知堂的回忆文——〈苦雨斋主〉序》，黄开发的《知堂小品散文的文体研究》，金性尧（文载道）的《知堂的两本书》，张中行的《再谈苦雨斋》等文。

⑤ 参见王福湘的《关于周作人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解志熙的《文化批评的历史性原则——从近期的周作人研究谈起》，《中州学刊》1996年第4期。

之讳，更不能像前几年有人造出新奇之说来为他翻这一案。”^① 这种批评与反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为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关系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进入 21 世纪，有关周作人文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学关系的研究开始出现大量的成果，并多有专题研究。首先是对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学关系在学术思想上的现代性价值的定位。纽约大学张旭东发掘周作人对传统文学转化的内在策略，认为周把一种线性的、“新与旧”冲突的文学史观转移成对传统内部一种激进异质性文学传统的重新定义和建构，在对传统的密切参与与无情区分中，将现代性冲突放在“传统”内，将新文学重新建基于再发明的传统之上。^② 张说超越激进与保守、现代与古代的争论，深刻剖析周氏小品文中蕴含的政治审美，代表本论题研究所实现的理论深度。其次是专题研究。周作人与晚明小品关系之研究一直是研究热点，成果数量众多，研究在多层面展开。如周荷初、黄开发、郝庆军、谭佳、何亦聪等人^③，考察周作人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关系、晚明小品的“反抗”性，辨析周氏小品文的晚明小品印迹，进而研究周氏“晚明叙事”及其审美现代性，认为周发掘晚明小品反抗性是重构现代散文精神源头，“建构”现代散文理论话语。周作人与六朝文关系方面，权绘锦对周提出的“人情物理”“趣味”“自然”等批评术语与六朝文进行了探源比较，指出周认同的六朝文是经过特殊选择的；^④ 高俊林的博士论文《现代文人与“魏晋风度”——以章太炎与周氏兄弟为个案之研究》继续追溯周与六朝文的精神联系^⑤。周作人与清人文章关系方面，陈平原梳理周作人对清代一大批此前不太被看好文章的重新阐释，认为周藏学问于随笔，散文体现

① 舒芜：《理论勇气和宽容精神》，《读书》1995 年第 12 期。

② 参见张旭东《“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诠释学》，《现代中文学刊》2009 年第 1 期，《现代散文与传统的再发明——作为激进诠释学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现代中国》第 12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③ 参见周荷初《周作人与晚明文学》，《鲁迅研究月刊》2002 年第 6 期，黄开发《一个晚明小品选本与一次文学思潮》（《文学评论》2006 年第 2 期），郝庆军《两个“晚明”在现代中国的复活——鲁迅与周作人在文学史观上的分野和冲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 年第 6 期），谭佳的《“晚明叙事”的美学话语建构与中国的审美现代性问题——以周作人的晚明研究为考察点》（《文艺争鸣》2008 年第 11 期），何亦聪《周作人与晚明人士》（《鲁迅研究月刊》2011 年第 9 期）。

④ 参见权绘锦的《周作人与〈文心雕龙〉》（《求索》2007 年第 4 期）、《周作人与六朝文学》（《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5 期）。

⑤ 高俊林：《现代文人与“魏晋风度”》，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4 年。

现代人眼光与趣味,实现“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①葛飞考辨周氏文体、思想与清儒笔记的关系,发现周摘抄清儒笔记的策略——将自己所受的藏不示人的西学“新名词”——对应地找出自己加以选择、改造并纳入自己话语系统的“旧名称”;^②周荷初认为周用“非正宗的别择法”发掘清儒笔记、日记、尺牍等“旁岔伏流”,有为“言志”新文学张本和抵制“新道学”左翼文学话语的策略意向。^③以上研究寻绎周之学养及言说策略,研究深化。周作人与唐宋文、桐城文关系方面,丁文等在周与1930年左翼文学批评的对峙与对话中考察其对古文的挖根式批判,认为周对传统文学发掘的深层原因是批判左翼文学背离了“五四”新文学言志方向。^④总体来看,本题研究,与晚明和六朝文相关的研究成果居多,与清人文章之关系的研究已趋深入,与原始儒家典籍之关系研究不足,与唐宋古文关系之研究重与左翼论争语境,内理研究偏少。

通过以上对80年代以来周作人文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学关系研究史的梳理,我们看到以往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研究已摆脱政治束缚,专注于周作人文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多方面关系,尤其在局部问题上,如周作人对六朝文章、唐宋文、桐城文、晚明小品、清人笔记的发掘方面都有专文论述,海外研究的传入也带来了周作人传统文学观的不同理解。同时我们也看到,现有研究还没有对周作人对传统文学的选择重构问题做专门整体性梳理、研究,周作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时段传统文学的发掘,以及这种发掘中涉及的问题还未被充分注意到。

二

周作人一生的文学思想倾向经历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前的文学复古时期,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时期和运动后的文学复兴时期,不同时期不同的文学思想倾向极大地影响了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也决定了周作人对传统文学选择建构的态度。在这种文学思想倾向的变化过程中,前一阶段的文学思想倾向并不在后一阶段中彻底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影响着后一阶段文学思想倾向的形成和发展。如在文学革命阶段,周作人前期的文学

① 参见陈平原的《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② 参见葛飞的《周作人与清儒笔记》,《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1期。

③ 参见周荷初的《周作人与清代散文》,《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6期。

④ 参见丁文的《周作人与1930年左翼文学批评的对峙与对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5期。

复古思想倾向极大地影响了此时期他的文学革命思想，文学复古思想倾向中的某些因素参与到了文学革命思想倾向的建构中；同样，在文学思想倾向文艺复兴的阶段，复古和革命的文学思想同样影响着他对此时期文学复兴思想倾向的建构。这种不同文学发展时期的不同文学思想倾向以及这种前后的影响，让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倾向呈现出复杂状态，这种复杂状态也决定了他在选择中国传统文学和重构中国文学传统的独特性。

（一）文学复古中蕴含革新

1901年，周作人来到南京就读水师学堂，很快读到了大量以前难以见到的当时各种书报，“庚子以后，在南京读到《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恍然如闻天启；读《饮冰室自由书》，觉得一言一语无不刻骨铭心，永不能忘”^①。在接受各种新思想时，他开始以一种激进的态度对待自身所接受的传统思想。1902年7月他拒绝回乡参加科举考试，12月作《焚书》诗痛砭正统经史典籍，诗中有“举世惟知珍腐鼠，穷经毕竟负须麋。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之句，诗后又说：

今世之人，珍经史如珍拱璧，此余所最不解者也；其他不具论，即以四书五经言之，其足以销磨涅伏者不可胜数，又且为专制之法，为独夫作俑，真堪痛恨。至于浮辞虚语，以并名学家所谓丐词者，尚其最小者耳。余尝恨秦皇不再，并非过论，同志之士，想亦为然。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然即斥为丧心病狂，亦余所不辞者也。^②

由此可见当时态度之激烈。但是到1905年左右，周作人思想出现变化，1月17日日记中有言：“近来我之思想大变，昔主强权，今主悲悯，昔主欧化，今主国粹，其不同如是。”^③1906年作《孤儿记》，为弱者的孤独无告而哀叹，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时代思想背景下，周作人思想的变化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是受了佛经的影响^④。到1906年秋，周作人东渡日本，后《新生》流产，1908年听章太

① 周作人：《我的负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325页。

② 此处引文录自周作人1902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

③ 周作人：《周作人日记》（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403页。

④ 1905年2月始，周作人初次阅读佛经，佛经在他后来文章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读佛经事周作人在日记中也有记载。

炎讲学，“听章炳麟讲学，则使周作人得以窥见中国文化的神髓”^①，周作人至此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将近十年的文学复古。

章太炎师从学问大师俞樾，在“五四”前提倡国粹和文学复古，胡适称其为“一个复古的文家”^②。“章氏论文，推崇诸子史家之文，讲究质实雅洁，对文士之文则多针砭。在他看来，近世文士，尤其唐宋以降，行文往往没有内容，纵横使气，而又缺乏节制。”^③章太炎的复古，并不因循守旧，而是“以复古为革新”，带有反清排满的民族革命色彩。周作人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学为期约一年多光景，其间大受章氏文学复古思想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周作人的写作和翻译中。周作人说：“丙丁之际我们翻译小说，还多用林氏的笔调，这时候就有点不满意，即严氏的文章也嫌他有八股气了。以后写文多喜用本字古意，《域外小说集》中大都如此……”^④在翻译方面，鲁迅、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鲁迅在序言中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⑤蔡元培认为其小说“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⑥。周作人翻译的显克微支的《炭画》，是其认为自己译文里最中意的一篇，然而投给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后的回信中说“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颇不通俗，殊为憾事”^⑦。可能由于翻译中强调“文字上的复古”，早期周作人、鲁迅的翻译小说销量很小，他们的工作不得不以失败告终，但他们“词致朴讷”“弗失文情”的“直译”精神，全然不取悦于大众读者的态度，使其彻底摆脱了林纾意译、演义甚至改写的翻译，为现代翻译确立了正轨。

其次，此时期周作人学习古希腊文，也可说是出于“复古”的思想。周作人后来回忆中说：

我并不重视那正统古文，却有时候还到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去听希腊文的《福音书》讲义，这乃是那时代的希腊白

① 止庵：《周作人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②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

③ 陈雪虎：《“文”的再认识：章太炎文论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④ 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第452页。

⑤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⑥ 蔡元培：《答林琴南书》，《大公报》1919年4月1日。

⑦ 周作人：《关于〈炭画〉》，《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第640—641页。